

# 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 “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

——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薛念文

**摘要：**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基本是执行了“以战求和”的策略，但是仔细考察这一策略的前后，可以发现他两次“以战求和”的程度有所不同，1932年他对日策略消极成分更大；1937年蒋介石感觉到已经无路可退了，在仓皇中决心应战，虽然其策略依然是被动的，但已有积极的改变。

**关键词：**“一·二八”；“八·一三”；蒋介石；抗战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4.31；K2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0-0179-09

**作者简介：**薛念文，同济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9）

关于蒋介石抗战策略的研究，学术界有一定的成果，如黄仁宇借助蒋介石的讲话稿和各种渠道公开的日记，对蒋介石的抗战策略进行过探讨，他认为“自‘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抗战开始的五年九个月时间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sup>①</sup>。这种评价是否公允，还有待商量，而其对上海抗战的论述过于简单则是一个遗憾。谢树坤、陈瑾注意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蒋介石抗战态度由妥协转向强硬，但是对他这一态度转变的过程，缺乏详细的资料补充说明<sup>②</sup>。对蒋介石抗战策略的转变，杨天石有过较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是因为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而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也是一个辅助因素，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勾践故事及老子思想的某些影响，则是重要的心理动因，他强调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sup>③</sup>。但遗憾的是，他对两次上海抗战的评述也流于简单。美国学者科博文努力勾勒了1932年上海抗战中，蒋介石在各种矛盾中左顾右盼，试图在国内矛盾与日本侵略势力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的画面，这使读者看到在战争决策中蒋介石的犹豫与彷徨。但他没有提及1937年8月的上海抗战，也无法对两次上海抗战中蒋介石的抗战策略进行比较研究<sup>④</sup>，国外其他的研究也因为资料的限制无法深入开展。

研究蒋介石上海抗战策略的转变，对了解他整个对日策略有重要意义。以往学者对蒋介石上海抗战策略的转变关注不够，即使有涉及到的，也因为资料的贫乏显得苍白，系统阐述蒋介石上

收稿日期：2008-01-21

① [美]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② 谢树坤、陈瑾：《试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③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④ [美] 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海抗战策略的转变，需要借助日记等直观材料，2007年蒋介石日记全文（1932-1945）的开放，对于此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本文以新近公布的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主，综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察他从1932年1月28日到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策略的变化，希望能以此文求教于学术界。

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窗口。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时蒋介石尚未正式恢复公职，面对风起云涌的军民抗战，蒋介石通过电报做了一个积极表示，“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国亡即在眼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sup>①</sup>！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3月18日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sup>②</sup>，就职后他必须面对抗战这个现实，“蒋介石对这次突发事件的最初反应是保证政府的安全”<sup>③</sup>，决定立即迁都洛阳。蒋认为固守南京情况不妙，相反如果迁都洛阳，能够争取主动，“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将来迁移结果不良时，必归罪于余一人，然两害相权较其轻，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监也，林汪皆赞同余之决心”<sup>④</sup>。他曾打算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集结兵力与日军对抗，但这些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对上海日军的进攻，蒋介石认为如果不做任何抵抗，上海有沦为“东北第二”的危险，而如果听任日军围歼抗战最为坚决的十九路军的话，“他无法承受完全丢弃中国守军的政治代价”<sup>⑤</sup>。因此，必须做些抵抗。为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他派八十七师及八十八师的3个团组成第五军调往上海，由张治中任军长，作为他“以战求和”计划的一部分，“决定警军全部加入，如倭军无和平诚意不肯退让，则与之决战，以此意转告外交当局，令其自动决定方针可也”<sup>⑥</sup>。不久，蒋介石在浦镇召见何应钦，令其电示蒋光鼐：“避免再战为主”，争取在“双方各自撤退至相当地点”的条件下立即停战，“从速进入外交途径”<sup>⑦</sup>。2月22日第五军在宝山战役中取得胜利，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赞赏，26日蒋介石发电给张治中表示慰问，“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10倍”<sup>⑧</sup>。

但是，蒋介石不想扩大战事。2月20日吴稚晖受张静江委托，到南京见蒋介石，声称十九路军既然已经鲁莽作战，索性背水一战，抗战到底，“今日之局，有如背水为阵，惟有前进，退无余地者也。既已无端而为义和团，大家止（只）有从并救人，盲目而共为义和团”<sup>⑨</sup>。但是蒋介石拒绝了，他打算在适当时机向日军求和，因为“终日思虑对日无良法，战则无可战条件，和亦国人所反对，如不战不和，则国家与人民被害日重一日，此时无人敢主张言和，而一味要我战，……惟有待亡而已”<sup>⑩</sup>。他决定与汪精卫合作推行“以战求和”战略<sup>⑪</sup>，这在与汪精卫等人的谈话中表达的很清楚，“精卫、敬之、真如等来谈，余仍欲以原定方针决战，胜利后亦即退后，

①③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6、100页。

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版，第442页。

③⑤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④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9日，第36箱，第1卷。

⑤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4日，第36箱，第2卷。

⑦ 《何应钦、陈铭枢致蒋光鼐电（1932年2月13日）》，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上海，1933年，第193-194页。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⑨ 吴稚晖：《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手迹），载《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转引自杨天石《近史探幽系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⑩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1日，第36箱，第2卷。

⑪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蒋介石推行的是“以战求和”的战略，如[日]土屋光芳在其论文《蒋汪合作政权的对日政策：从不抵抗政策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经论丛》第62卷第1号，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1993年11月。转引自[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以交涉途径进行，以先示弱与和平之意，而准备仍以抵抗到底也”<sup>①</sup>。这充满矛盾的表述，显示他的备战和决战都是为求和而准备的。

获知中国军队取得胜利后，他决定休战并借机同日本人谈判。“中日为什么会休战呢？一方面固由于友邦的调停，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力量不够，不能不忍痛一时，来争取充分准备的时间吧？”<sup>②</sup> 决定战略退却，是因为蒋介石对日本人实力估计过高，“中国为久居帝国主义者处处干涉重重束缚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着手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sup>③</sup>。所以在双方开战不久，蒋介石就关注汪精卫议和，他决定：借英、美的调停达到妥协目的，“今日汪欲赴蚌埠与之谈外交方针。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寸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则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余反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并明告对日交涉注重其军部之途径”<sup>④</sup>。

醉心于剿共是 1932 年蒋介石决定妥协的又一重要因素，“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sup>⑤</sup>，他认为军队整顿不够，国内政治还不统一，“外交无进步，日本必延拓以待国内之变化，我人对策只有团结内部，动以精诚，使离者令叛者服以一致对外也。航空与绿（氯）气厂尚无进步，军队整顿亦未着手”<sup>⑥</sup>。

国民党内部不统一，是他主张妥协的又一原因，“我们要晓得中国的军队过去之所以不能对外，不能达成御侮救国的任务，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指挥不统一”<sup>⑦</sup>，缺乏明确的计划。他认为军队素质不够好，无法在战争中取胜，“整军计划应从速决定”<sup>⑧</sup>。

在推行“以战求和”战略时，蒋介石注意运用外交手段，他告诉英美代表中国有长期抵抗日军侵略的打算，“今日以个人名义密问英美态度，中国决作长期抵抗之意示之”<sup>⑨</sup>。希望英美代表转达，对日军产生威慑作用，而当英美代表劝说他拆除吴淞的军事装备时，他非常冲动地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在日记中他记载“下午与英使蓝浦生谈话，余对以如彼代日再谈吴淞卸除军备事，则余即不与之再谈，余认为污辱我中国人异甚，彼自知失言不再谈”<sup>⑩</sup>。

中日两国谈判期间，蒋介石打算加强军备，并决定与德国合作，“此时对于国防，惟有与德国联合，用其人才与物资，并研究对日秘密国防，飞机厂、绿（氯）气厂、火药厂、炮工厂、硝酸厂应宜急办也”<sup>⑪</sup>。蒋介石打算效法德国秘密整顿军备，加快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国防计划极望粤汉与周成二铁路能于二十五年（民国）完成，故急思统一广东，……而江防与浙鲁两省之海防则应力谋其成，故南自舟山镇海，北至海州青岛之海防务须如期谋成也。现时以修理各县城墙与修筑军备重心之交通马路与防空设备最为要紧也”<sup>⑫</sup>。四月他加大了对军队建设费的发放，“与子文谈军事，决发炮兵建设费与航空建设费，月支 40 万元”<sup>⑬</sup>。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上海周边地区的布防，“此时应专心建设军事江防、射击场、航空学校、汤山、徐州、新乡、汉口之营房、化学厂、硫酸厂为务”。在军事准备的同时，他认为党务建设也应该加强，提高军队战斗力，对日保持低调，积极准备，“外交无甚进步，军事组织避免倭寇注意”<sup>⑭</sup>。从准备的内容、规模和区域分布来看，是针对日本人的。

①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2 月 24 日，第 36 箱，第 2 卷。

② 《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9 页。

③⑦ 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 1 册，中华大典编印会 1968 年版，第 142、809 页。

④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2 月 4 日，第 36 箱，第 2 卷。

⑤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 34 页。

⑥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3 月 29 日，第 36 箱，第 3 卷。

⑧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3 月 30 日，第 36 箱，第 3 卷。

⑨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2 月 20 日，第 36 箱，第 2 卷。

⑩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2 月 28 日，第 36 箱，第 2 卷。

⑪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4 月 1 日，第 36 箱，第 4 卷。

⑫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4 月 2 日，第 36 箱，第 4 卷。

⑬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4 月 26 日，第 36 箱，第 4 卷。

⑭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 年 4 月 5 日，第 36 箱，第 4 卷。

“一·二八”上海抗战，中国军队表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对日本军队打了一次平手”<sup>①</sup>。但由于蒋介石执行“以战求和”的战略，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达成了三项谅解：（1）中国取缔抗日；（2）十九路军换防；（3）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不得驻兵。依照这一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只能留在苏州、昆山一带，不能进驻上海<sup>②</sup>。这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尊严，而且在1937年8月的战争中，使中国军队失去了主动地位。当时的报纸就指出了这样做的巨大危害，“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家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魁”<sup>③</sup>。

虽然蒋介石认为对日妥协是迫不得已，但毕竟使中国丢失了重大权益，对此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民党广州党部在通电中列举该协定的缺点时指出：沪事随东北事件发生，应全部解决，今协定绝不提及东北，是不啻放弃东北，与我代表在国联声明三项不符”<sup>④</sup>。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写信给“一·二八”事变的点火罪犯田中隆吉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sup>⑤</sup>。伪满洲国的成立也变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 二

以备战为目的对日军做出让步，蒋介石希望能激发日本军阀的骄气，促使其国内发生变乱，“日本军阀击毙其内阁总理犬养毅，并到处发现炸弹，此为倭寇内政一大变动，其乱可立待”<sup>⑥</sup>。让日本侵略者自我膨胀走向灭亡，是蒋介石此时策略的一个明显倾向，“倭寇既欲得地，又怕我为敌，可痛、可怜异甚。余当求达我延长时期之目的，养其骄而著其罪，避其实而养我晦”<sup>⑦</sup>。他认为与日本人竞争军备并不可取，“如与倭寇竞争军备则适足速亡而已”<sup>⑧</sup>，而对日妥协，寻求苟安，则为上策。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再次做出让步，军队从长城沿线后撤，并将古北口至山海关等地划为缓冲地带<sup>⑨</sup>。此后日本人又进行了一系列挑衅：如日军以藏本的失踪为借口，妄图发动侵略，蒋介石依然忍耐着“倭寇以藏本事件为威胁实施之始乎？无论其事真伪，而其威胁时期已难再缓”<sup>⑩</sup>。不久后藏本被找到，蒋介石松了一口气，“藏本寻获，倭寇无威胁之机，故暂免祸患，此实天佑中国之北也”<sup>⑪</sup>。热河失陷后，日军又转向平津，面对平津失陷的威胁，蒋介石打算直接求和“与其抗战失败而失平津，不如自动撤退免倭籍口，以保全平津，而图挽救此总退却之胜利也”<sup>⑫</sup>。这使中日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显然强化了日本对河北和察哈尔的控制，对南京政府则是一个灾难”<sup>⑬</sup>。

让步换来的仍是日军进一步膨胀的野心，“以‘分离华北’为重点，企求朝着‘分治’和全

① 黎东方：《蒋介石序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88-289页。

②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3页。

③ 《时事新报》，1932年5月6、7日。

④ 翁有为、赵文远等：《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⑤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⑥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16日，第36箱，第5卷。

⑦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年10月10日，第36箱，第10卷。

⑧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2年10月23日，第36箱，第10卷。

⑨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7-309页。

⑩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4年6月11日，第37箱，第8卷。

⑪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4年6月16日，第37箱，第8卷。

⑫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5年6月15日，第38箱，第2卷。

⑬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面控制中国的方向推进”<sup>①</sup>。他们提出的条件让蒋介石非常难堪，“倭寇要求我河北党部取消中央军队撤离河北，免冀于察宋二主席之职与宪兵团长蒋孝先、政训处长曾扩情各职，取消北平励志社并派飞机任意侦察监视我军撤退之行动。18日且飞至济南、徐州纵横盘旋威胁，呜呼”！这刺激了蒋介石，“倭寇文字言论，公然以中国人为虫而非人，而国人毫无组织不知奋勉，思之忧惶失措，然而，此次事变实等于九一八之巨祸，而全七月中倭寇空军飞越洛（即洛阳，笔者注），攻徐、济横行无忌。北平机场，令我不得干预过问，奇耻大辱，至此能无志乎”<sup>②</sup>？但蒋介石的志向没有体现在军事反抗方面，而是加紧国内经济建设，“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专心于国家建设，致力于完备近代国家所需要的设施”<sup>③</sup>。

此后，蒋介石对日策略上可以退却的空间进一步缩小<sup>④</sup>，“倭以要求本党改组与承认伪满为其最后目的亦为我国之致命伤”<sup>⑤</sup>。他有时甚至冲动地认为无法再迁就日本人了，“故为今之计，只有自强、自立奠定最小之基础，以备最后之周旋，则或有以柔克刚之一日也”<sup>⑥</sup>。但缺乏明确的方针、策略，而自认为军备还不够成熟，指挥还不够统一<sup>⑦</sup>，他对日军仍然隐忍不发。面对日军的挑衅，蒋介石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北宁路劫车二次，刘佐周被刺，英国记者在宝昌被倭匪刺死，皆欲贾祸于我者，结果幸皆无事，此为倭寇有计划之动作，竟未发生事故，是以静制动之效乎”<sup>⑧</sup>，侥幸能免去一时之乱，但作为抗战策略，则非常危险。

到1935年下半年，国家的近代化设施进一步完备，国民政府“剿匪”工作也进展顺利，河南省主席刘峙宣布“夫攘外必先安内，乃政府原定之计划，今赤匪已经消灭，国内已届安定，即政府原定之计划，已成功一半矣”<sup>⑨</sup>！此时日军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倭将乘英意冲突之时夺取英国在华南之势力，然后再逼中国屈服，非仅承认伪满组织而已，其目的乃在全国军事与经济皆操于其掌中也”<sup>⑩</sup>。显然，对日军一味妥协退让，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对倭惟有自强与力抗以外再无其他方策”<sup>⑪</sup>。华北事变后，蒋介石表达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冀于既去，察宋又撤，党部取消，军队南移，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sup>⑫</sup>。而统一两广后，在处理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时蒋介石态度明确，“中国政府准备依照国际惯例即时解决”<sup>⑬</sup>。从中他表达了不再退让的想法。

日益恶化的华北形势让蒋介石觉察到了日本人的叵测居心<sup>⑭</sup>，他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恐怕难以避免，“以倭寇之横逆，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未料及启衅以后，决无议和之时，非我亡即彼亡也”<sup>⑮</sup>。但他希望能推迟这种对决，“须勿忘却牺牲的准备，不可放弃忍痛一时的目的”<sup>⑯</sup>。而在同一周的“本周反省录”中既表达了他准备牺牲的决心<sup>⑰</sup>，又“持其志毋暴其气，对倭虽准备

① 沈予：《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特征》，《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5年6月本月反省录，第38箱，第2卷。

③ [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④ 佟冬、解学诗：《华北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阴谋》，《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⑤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5年7月30日，第38箱，第3卷。

⑥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初本周反省录，第38箱，第4卷。

⑦ 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第809页，蒋介石指出关于抗战的要件“就是我们要晓得中国的军队过去之所以不能对外，不能达成御侮救国的任务，最大的原因就是指挥不统一”。

⑧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初本月反省录，第38箱，第4卷。

⑨ 刘峙：《世界战云弥漫中之中国前途的曙光》，《中央日报》1935年1月1日。转引自[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⑩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初本月反省录，第38箱，第6卷。

⑪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8日，第38箱，第6卷。

⑫ 蒋委员长致何应钦部长商今对日方针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688页。

⑬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5页。

⑭ 沈予：《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特征》，《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⑮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24日，第39箱，第2卷。

⑯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25日，第39箱，第2卷。

⑰ 蒋介石认为只要中日发生战争，中国必然失败，就只有“牺牲”，蒋介石对与日本人发生正面战争一直很悲观，在对日战略上，一直缺乏足够的勇气。

牺牲，但仍不忘和平与待时之方针，而此心终觉倭寇必被余制服不敢为余之敌也”<sup>①</sup>。看着中国主权在一点点被蚕食，矛盾的心情仍促使他忍耐，“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年以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sup>②</sup>。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采取的对策是一忍再忍，“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军事上，励行保甲，训练壮丁，以期举全国皆兵之实”<sup>③</sup>。

对于隐忍的极限，他在日记中表述得比较模糊，因为“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蒋介石从自己独特的战略理论及国际形势认识出发，一直认为与日本正面对决为时尚早”<sup>④</sup>。1936年9月18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东北四省被倭强占已呈五年，自今日起自信已入收复准备时期”<sup>⑤</sup>。但他也强调“对倭仍应极端忍耐为要”<sup>⑥</sup>。“蒋介石预测，从1934年不断发生的日本与苏联的局部军事冲突会发展为日苏战争，进而1937年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蒋介石欲趁日本‘和平’期间确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以备将来。”<sup>⑦</sup>所以他决定“对倭不宜过于冷淡，免俄居奇，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三年之内不遭外患，必有内乱，革命之起可立而待也”<sup>⑧</sup>。这种幻想仍表现了蒋介石对日问题上的矛盾、犹疑。

蒋介石继续加强战备工作，1936年在民众的抗战要求下，他的态度逐渐趋于强硬，“这一年中最重要的进展是赞成抵抗的民众舆论的剧长”<sup>⑨</sup>。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反应了国民党内部对抗战与否的剧烈争论，也促使蒋介石明确对日方针。“当张学良让蒋介石当了阶下囚的时候，张发布了号召，这一号召本该受到欢迎……然而，人民不听他的；……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行动意外地使蒋介石成了中国人民最大希望的象征”<sup>⑩</sup>，西安事变使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再对日本人做无限制的退让，他不仅要失去民众支持，而且也要失去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核心地位。此时战备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因此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必须做出明确的抉择。

### 三

1937年7月7日，日军突袭北平郊外的卢沟桥，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于如何应战，并无多大把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搞挑衅，甲，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sup>⑪</sup> 他对应战与否仍然感到很矛盾<sup>⑫</sup>。

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他意识到形势非常严重，但不断提醒自己“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sup>⑬</sup>，矛盾中他决定调六个师北上，对日战争把握的原则仍是：在短时间取得战场上优势，达

①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24日，第39箱，第2卷。

②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4年4月5日，第37箱，第6卷。

③ 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第142页。

④⑦ [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⑤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6年9月18日，第39箱，第2卷。

⑥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25日，第39箱，第9卷。

⑧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11日，第39箱，第10卷。

⑨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⑩ [美]D. 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坎布里奇1964年版，第226页。转引自[苏]沃龙佐夫《蒋介石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⑪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8日，第39箱，第13卷。

⑫ 蒋介石一直认为日本不敢宣战，“倭必不敢正式宣战，而我则应准备宣战，造成宣战之形势，并暗示一经破裂，则我非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不可，使不敢常作小规模之扰乱，而我则可转入主动地位矣”。蒋中正档案，文物图书一事略稿本，民国二十五年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2日条；《困勉记》第39卷。转引自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7月7日日本军的进攻，在蒋看来也许仍然是一个小规模挑战。

⑬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2日，第39箱，第13卷。

到议和目的，“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sup>①</sup>。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采取的是以固守阵地为主的防御作战。7月28日他给宋哲元的电报说：“此时应敌，先要固守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sup>②</sup>“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蒋公投进了七十个师，七个旅，一个保安总团，一个教导总队，与若干保卫队与炮兵单位，加上空军与防空部队，海军与鱼雷部队，我方的总兵力在七十五万人左右。敌人也投进了九个师团以上，总兵力不下于二十五万人”<sup>③</sup>。蒋介石投入大量军队在上海战场，表明了他对这场战役的重视，关于采取的战术，8月18日蒋介石在《敌人战略政策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讲话中，正式宣布了他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实现这一目标的作战原则是：以静制动，以主动制被动，固守阵地，坚忍不退。9月2日他致电张发奎“浦东方面登陆之敌，务必极力拒止，即或不能拒止登陆，亦须设法围困，扼制其发展为要”<sup>④</sup>。在战争中，持久的阵地战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

蒋介石抗战虽然是“努力的”，但是，他战略不清，战术迟滞、呆板。张治中后来回忆说：“至于上海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在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sup>⑤</sup>先是贻误了战机，后李宗仁认为“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sup>⑥</sup>时，蒋介石又坚持死守。而且在战斗极为困难，“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sup>⑦</sup>时，仍然“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sup>⑧</sup>，从而丧失了战略撤退的最佳时机。最终，中国军队全线仓皇后撤，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

为了扼守上海，一些阵地战是必要的，但大规模、长时间采用这种战略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使装备相对落后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据白崇禧回忆：“自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27年6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低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sup>⑨</sup>

蒋介石采取如此呆板的战术，与他“以战求和”的一贯策略不无关联。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对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仍感到遗憾，7月中旬他“检阅二十四年七月旧卷，当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一若第二伪满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不可免者？而今日则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不顾倭寇之一日，其间进退优劣之势相差果为何如？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这种幻想使他遗憾被舆论所左右，“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寇）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之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日）外交失策，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戒之”<sup>⑩</sup>。

此时在“以战求和”战略中，他非常重视英、美等国对中国军队抗战的反应，“妻由沪来会，……闻彼谈上海各国司令，对我军撤退计划之成功，与闸北仍留孤军奋斗之英勇敢死精神，言时英国司令为之声泪俱下，敬仰我军不置，呜呼！毕生革命精力与苦心至此渐显乎”<sup>⑪</sup>。因为他对英

①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初本周反省录，第39箱，第13卷。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③ 黎东方：《蒋介石序传》，第365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⑥ ⑦ ⑧ 《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行，1980年，第692-693、695、695页。

⑨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⑩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本月反省录，第39箱，第13卷。

⑪ 1937年10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事后据宋美龄讲，这并非事实，当时英美舆论对中国军队在抗战战场上的表现并不满意，对国军的溃退极尽讽刺之能事。宋之所以这样告诉蒋介石，是怕他得知真相后灰心。这实际上是宋美龄编出激励蒋介石的美丽谎言。

美干涉的期望过高，所以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他没有发动民众进行积极抵抗，而常常将命运寄托在外交上，这样如何积极抗战？“蒋总司令又认为，主要的抵抗方式并不是群众性的抗日行动，而是要与国外合作，与美国合作，与英国合作。”<sup>①</sup>当然对俄外交，也是蒋介石与日本谈判的砝码，“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伪满与华北特殊化，若先与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为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sup>②</sup>。

不过抗战中日军的残暴，使一度热衷求和的蒋介石感到绝望，1937年10月11日，在证实了日军在战争中使用芥末毒气后，蒋介石不仅感到震惊，而且非常愤恨，“敌用芥末毒气已证实，益增我痛恨而已”。此外，他在日记中也间断地记载了日军的残暴举动，10月27日，日军让被俘的中国士兵自己挖坟坑，排好队，用机枪射杀他们，再将泥土推平掩埋尸体。对日军的这种残暴举动，他表示“残忍野蛮行动为之唾骂之，人格不啻有霄壤之别”。从日军的暴行中，很难想象他们会有和谈的诚意，而蒋介石操纵的中日秘密会谈也陷入僵局。军事挫败与外交谈判不利，促使蒋介石反思自己的求和策略。1937年10月底他总结这次战争时认为：战争虽然是被逼无奈、难免要打的，但是，对日妥协也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奏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惟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倭寇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处置中国后，决不敢对俄开战，故我国虽叛与倭谋妥协以待机决不可能；总之，倭寇对我，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无可挽回。亦不能用任何策略转移者也；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召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全国格，留待后人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sup>③</sup>？

最后一句话暴露了蒋介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动机，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仍缺乏战胜日本人的信心，残酷的现实逼迫他抗战，而日军的残暴与强硬，使蒋介石“以战求和”的战略难以施展，这使他更加希望借助英美的干预来阻止日军。但是，这依旧为蒋介石一厢情愿，1937年9月14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在远东保持中立，美国商船或挂着美国国旗的船只，禁止将武器及其他用于军事行动的任何装备运入中国或日本<sup>④</sup>。这对中国的打击无疑远远大于日本。美国由于孤立主义盛行，没有对蒋介石的调停要求予以积极回应<sup>⑤</sup>。而苏联也没有兑现诺言，“苏俄……所允飞机约定月底抵兰（州），至今尚未一机到着，而且召其大使回国，不知其用意所在，……，英美政府虽仍冷淡，但其民众已趋于积极声援，此乃牺牲坚忍之效，而多得于吾妻宣传之果也”<sup>⑥</sup>。这说明蒋介石对英美的干预仍然抱有很大希望。

## 结 论

综观蒋介石的对日策略，1932年至1937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他逐步艰难地实现了从

① [苏] 沃龙佐夫：《蒋介石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②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第39箱，第13卷。

③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第39箱，第16卷。

④ [苏] 沃龙佐夫：《蒋介石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⑤ 丁则勤：《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第68-69页。1937年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曾希望美国出面调停，在1937年11月3日，布鲁塞尔会议当天即1937年11月3日通过美国大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转交了一份对日“和平方案”，寻求在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原则基础上解决，建议日军适当撤退到7月7日以前的人数和位置。另据《美国外交文件》1937年第4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4年，第150-152页。

⑥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9日，第39箱，第15卷。



不抵抗到抵抗的转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他对战争几乎毫无准备，国民党内部帮派林立，“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来抵抗日本侵略”<sup>①</sup>。他对日本侵略者“一边抵抗、一边谈判”，谈判结果做出了重大让步，此时是彻头彻尾的“以战求和”战略。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后，蒋介石几经犹豫做出了“最后关头”的判断，到了8月13日，当上海再次遭受日军攻击时，他虽然还在与日本人进行秘密和谈，但这不排除是一种策略<sup>②</sup>，他把大量的嫡系部队投入了淞沪战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表现出“九·一八”以来最积极的抗战态度，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表现最为坚决的一次，当时他认识到“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sup>③</sup>？但是，在整个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仓促迎战，战术缺乏灵活性，重兵投入的这场战役，虽然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之想，可中国军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同时，“八·一三”抗战也暴露了蒋介石抗战策略的局限性。前后两次上海抗战间隔有五年之久，蒋介石虽然做了比较积极的备战工作，但到1937年8月仍然没有对日作战的明确方略，简单地归结为准备不足，显然是不够的。这与蒋介石推行“以战求和”政策有关。所谓“以战求和”，“归纳蒋主战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战，而在和”<sup>④</sup>。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把最大的希望仍然寄托在英、美、俄的帮助、支持上，他对中国独立抗战一直缺乏信心，而观念保守、思维陈旧使他不愿让民众参与进来，“我的反应是：由于蒋介石的思维方式在某些方面是古代的，我能否讲点或写点什么来修正他的观点，使之在这个现代世界上更加现实呢”<sup>⑤</sup>？不过稍微值得肯定的是，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八·一三”抗战，蒋介石的“以战求和”有相当积极的转变。更为可贵的是，武汉会战后在国际调停无望、与苏联联合不顺利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投降，而是采取了“苦撑待变”的抗战政策。

（责任编辑：陈炜祺）

①⑤ [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1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37年度第4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4年，第150—151、191页。蒋介石当时呈送美国政府的对日和谈条件是有明确限度的，如“继续7月7日以前商定的中国与‘满洲国’的关系，暂不谈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接受在南京中央政府支配之下建立的华北当局，取消自1932年至1937年在日本压力下成立的一切非法政权，日军限于辛丑和约规定的地点、人数与其他国家相匹”。转引自丁则勤《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③ 胡佛藏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9日，第39箱，第15卷。

④ 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